

## 《小小小小的火》的“症候”解读

李雪松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重庆 401520)

摘要:美国华裔作家伍琦诗2017年的新作《小小小小的火》面世后获得2017年美国亚马逊年度小说殊荣,随后大奖不断。其主题、人物形象、创作手法等都极为丰富,堪称完美。但细读之下,小说的时间和情节设置、对中国的想象、人物关系等都出现或大或小的“症候”现象。阿尔都塞、马舍雷等学者的“症候解读”理论为读者解读这些“症候”细节提供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小小小小的火》;症候解读;时间;情节;中国想象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039(2019)01-0153-02

美国华裔作家伍琦诗自2017年出版其第二部长篇小说《小小小小的火》以来,受到广泛好评,被评为2017年亚马逊年度小说,并且随后拿下27个大奖;有评论甚至直言不讳地美誉这部力作优于其第一部长篇《无声告白》。诚然如评论界所言,这一新作主题蕴含丰富,人物形象生动,结构精巧紧凑,创作手法多样……但细细品读之下,会发现其故事时间、情节的设置、人物间的关系、对中国的想象等都出现一些“症候”现象,使读者产生诸多疑惑。在此从“症候解读”理论入手,对文本中的症候现象进行探讨,以丰富读者对此畅销小说的阅读体验。

“症候”源自弗洛伊德,后经过阿尔都塞、马舍雷等人的发展,逐渐形成“症候解读”理论体系,并将之引入文学批评。它既是一个理论概念,又是一种应用方法,为读者阅读、理解文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范式。所谓“症候解读”,意指无论在理论还是文学的文本中,总是隐含着某些空白和缺失,表现为沉默、脱节和疏漏,读者必须像医生诊断和治疗病患一样,从这些“症候”入手,去解读出这些文本背后隐秘的、缺场的东西,去发现更大、更重要的问题。哪怕经典文本,也极大可能存在诸多“症候”,对之进行解读的过程,就是将作品、读者、作者及外在世界联系为一个整体的过程,也是作品真正生成的过程。

### 1 时间设置之“症候”

小说《小小小小的火》第一句话就设定了故事发生时间是夏天,紧接着点明了细节“五月的那个星期六”。第二段中,里查德森太太回忆前一天晚上她的房客米娅开车来还钥匙的情形“她看得并不真切,而且现在是五月,晚上八点时天几乎已经黑透……”这说明米娅在八点过后到达里查德森太太家的。里查德森太太家离出租屋并不远:经过一长段拐弯和鸭池塘,再穿过一条大道和几条轻轨铁路即可到达。这段距离如果步行,她的小女儿伊奇也只“花了二十五分钟走回家”;如果开车,最多十分钟车程。以此推算,米娅是在晚上八点左右开车离开出租屋的。

第十九章里,伊奇独自在家,“六点刚过,穆迪终于回家了”。随后伊奇和穆迪交谈争论了一番后,离开家。她花了四十分钟去找姐姐,找到后又花了些时间聊天。然后又花了四十分钟步行到出租屋。此时应该是八点后,而出租屋已经人去楼空。“她在门口的人行道上踌躇了片刻,”然后询问楼下的房客杨先生米娅的去向。杨先生的回答则出现了谬误“她们大概五点钟的时候离开了,十分钟之前。”如果她们五点钟离开,

五点钟十分就应该到里查德森太太家,那么小说第二段指出的时间“晚上八点”就是错误的;如果她们“十分钟”之前离开的,就应该是八点离开的而不是五点,这也契合开篇的时间设置“八点”。由此可以推知杨先生回答的“五点钟”是一个谬误。

那么问题随之而来:是作者时间推算错误呢?还是笔误将“八点”写成“五点”?抑或是故意设置了一个错误的时间?不管是哪一种,谬误已经形成;阅读时探寻谬误背后的原因就非常有意义。伍琦诗作为一位新秀作家,写作态度非常严谨,推算这几个时间点又极为容易,所以不应该是推算错误;如果说作者是笔误也有些牵强,因为她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团队,包括她的经纪人,出版商等,这样明显的错误逃不过众人的审视。若是作者故意为之,那么其意图为何?想通过这个“症候”告诉读者什么?

聚焦在回答者杨先生身上,或可见端倪。他来自中国香港,“在美国举目无亲,讲英文时磕磕巴巴,口音浓重”。虽然他移民到美国已经很多年,但是依然一口浓重的口音,以至于里查德森太太和他交流时,也只能似懂非懂。作者让他把英文“八”说成“五”,恰恰能体现他的英文水平很差,尽管在读者看来这有些不可思议。再结合小说里另一位中国人贝比“英文很蹩脚”、“她的英文并不流利,阅读理解能力几乎为零”的状况,就不难理解时间错误这一“症候”背后的真实意思:通过下层华人“英文差”这一刻板印象,导致口误,来展现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贫困无助的底层生活现状,以补充说明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种族问题。

### 2 人物关系之“症候”

小说塑造了两位杰出艺术人物形象:波琳·霍桑和梅尔。波琳是“美国现代摄影艺术先驱”,是女性主义摄影家的代表,她的作品“以即时性和暧昧氛围的营造闻名,擅长将女性气质与个性相结合”,属于前卫和流行艺术。作为米娅在艺术上的老师和伯乐,她对米娅的成长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对米娅的赏识、肯定、鼓励,支撑着米娅在艰难的追寻路上从没放弃过艺术和自我。梅尔是一位诗人,对米娅也尽力帮助。跟着她们俩,米娅发现“所有东西都蕴含着精微玄妙之处和未被揭露的一面——或者不曾被发掘出来的深度……”之前米娅是凭艺术本能来看待世界,在两位老师的引导下,她不仅去感受世界多维的存在,还拓展其深度,挖掘事物的思想与主题。

米娅每次遇见梅尔都是在波琳家。作者凡是叙述她们时

收稿日期:2018-09-22 修回日期:2018-10-11

作者简介:李雪松,女,四川省宣汉县人,文学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跨文化交际和汉语国际教育。

栏目责任编辑:王力

中外文学文化研究 153

都是把两位艺术家作为一个整体。“米娅每次登门拜访,波琳和梅尔都坚持留她吃晚餐。她们已经……她们还会留米娅过夜,甚至希望她搬到客房里长住”;米娅到波琳家拜访,是“波琳和梅尔打开门”;就连门房都知道楼上的两位“Lady Artists”。波琳病重米娅去看望她时,小说中明确提到米娅来到了“波琳和梅尔的公寓”;在波琳为米娅母女拍照时,梅尔“端出一壶茶,在波琳肩膀上搭了一块披肩……”这些细节都显示出波琳和梅尔的关系非同一般,甚至有些隐晦和暧昧。但她们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却不得而知。

虽然二者的关系不是一个关键点,可是作者为什么要着墨将两位艺术家处处并置在一起?而对她们的关系又讳莫如深,保持沉默,留下空白。如果不将二者并置,也丝毫不影响小说主题和人物形象等,甚至对读者解读小说更有帮助,至少不会造成困扰。那作者这样设置岂不是多此一举?毫无疑问这又是小说文本的一个“症候”。基于波琳和梅尔成长的时代背景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美国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嬉皮士运动等如火如荼的时代这一历史事实,再结合作者多次描述的各种社会活动场面,如反越战示威,可以推知展现波澜壮阔的时代大背景是作者的意图之一。既然波琳是一位女权主义者,而在以反叛、颠覆为宗旨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下,波琳和梅尔的关系极有可能是对传统的反叛和解构。她们之间一起温暖、互爱、互撑的状态,也是当时女性之间关系的常态。通过米娅的视角,她们二人一起生活的细节更是印证了这种状态。

### 3 情节细节之“症候”

整部小说的故事情节相互穿插。以米娅母女来到西克尔高地与里查德森一家有交集为起点,接下来是米娅与贝比、里查德森太太和闺蜜麦卡洛太太两条分支,又因为贝比在米娅的鼓励下和麦卡洛太太争夺女儿,里查德森太太为助闺蜜而报复米娅;调查米娅的过往,最后逼得米娅离开。四个家庭的故事情节,环环紧扣,精简紧凑。

几乎所有故事情节都非常合理。但小说最后一章里,关于贝比结局的细节却有“症候”出现。贝比输了官司,失去了女儿的抚养权;不仅如此,她连探视权也一并失去:“麦卡洛夫妇取得了孩子的全部监护权……终止生母的探视权”。此时“疯狂”的贝比做出了一个惊人的超越理智范围的举动:偷孩子回中国。她趁麦卡洛夫夫妇因为赢了官司而放心大胆沉睡之际,偷偷潜入麦卡洛家,抱着熟睡的女儿离开,而文本“症候”随之出现。“他们发现,贝比订了一张前一晚十一时二十分飞往中国广东的机票。”这里作者无意识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只有一张机票回不了中国。婴儿也是需要机票和护照之类证件的,否则根本无法出关登机,更不用说进关回到万里之外的中国。

由此可知贝比带着孩子回到中国是作者的一种愿望,是对贝比及孩子结局的最好安排,正如米娅所言,“母亲有权抚养自己的孩子”。如果作者倾向于骨肉不分离,像设置米娅和女儿那样,但是又为何不直接将抚养权判给贝比呢?究其原因,“种族界限”应该是其主要因素。在西克尔人眼中,他们没有种族歧视;但在少数族裔观念里,种族问题非常明显。贝比和白人争夺自己的孩子,这本身就涉及种族问题,就如赛丽娜母亲在受访时的话语“假如这个孩子是白人,今天还会有这场白热化的辩论吗?”孩子不判给亲生母亲贝比,是因为她贫穷,收入低于最低标准,连申请社会救助都不知道,无法给孩子正常的生

长环境。但是贝比为什么贫穷呢?她从早干到黑,勤俭节约,却连自己的孩子都养活不了。黑人妇女克莱尔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不首先改变有弊端的社会制度呢?”通过这些代言人,作者伍琦诗也看到了问题原因所在,但她无法背离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无法把孩子“还给”一个“他者”形象贝比;同时她又同情弱者,赞成孩子和母亲的天然联系,所以最后设置了一个“症候”情节:贝比偷孩子回国。作者把解决问题的方式简单粗暴化、非理性化;把现实的不可能放进文学作品中虚拟化。这也表明她在看待种族问题时也有一些矛盾存在。

### 4 中国想象之“症候”

对于一个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来说,伍琦诗对中国的认知有一些缺口。除了美国文学中司空见惯的对中国形象习惯性的描写,如中餐、熊猫、辫子、苦力帽子等,还有对东方的想象,譬如露天市场;更涉及对亚洲男人的界定:谦虚礼让与世无争。这些西方人想当然地认为的中国元素,通过贝比的律师——华裔中产人士进行否定,从而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东方主义”视角下的东方认知。

真实的中国是怎样的?伍琦诗的形象是粗略的,缺乏逻辑和细节。贝比带走孩子后,“警察告诉麦卡洛夫夫妇,他们不太可能找到贝比了,因为中国很大”。中国的“大”是事实,可这和找不到贝比不能构成因果关系。麦卡洛夫夫妇“花了数万美元雇佣侦探和联系大使馆”寻找贝比,最后却一无所获;显然作者对中国内地的想象也是随意性的,不符合实际情况。麦卡洛太太一想到女儿,也只能想到她“正在遥远异国的某处过着遥远异国的生活”。“大”“遥远”“异国”这些概念化的抽象的词语承载着作者对中国的想象,毫无细节可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在学者马舍雷看来,作品与作者的意识形态有关。由于意识形态的局限性,作家的创作受到束缚,经常会有些没有说出或不能说出的东西,这种“无言”状态也许是无意的,也许是有意的,从而作品不能不出现某些空隙和沉默。因此在解读作品时,不是看它说出了什么,而是看它没有说出什么。正是在作品的沉默、间隙和空白中,最能体现作者意识形态的存在。《小小的火》中这些“症候”也正是作者伍琦诗受意识形态影响有意或无意设置的空隙、沉默抑或谬误。作为少数族裔作家,对种族问题、少数族裔人群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有所关注是一种必然;同时作为美国土生土长的当代畅销小说作家,骨子里已经向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靠拢和归化,即一方面对下层移民给予同情及美好愿望,另一方面又俯视这些“他者”人物形象,使其在主流社会里无所归依。

### 参考文献:

- [1] [美] 伍琦诗. 孙璐. 小小的火[M].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
- [2] 蓝江. 症候的精神分析与文本病理学——对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的批判式解读[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2): 129
- [3] 姚文放. 症候解读:文学批评作为艺术生产[J]. 文学评论,2016(03): 55
- [4] 姚文放. 将“症候解读”引入文学批评——马舍雷的文学生产理论[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1):115.

【通联编辑:王力】